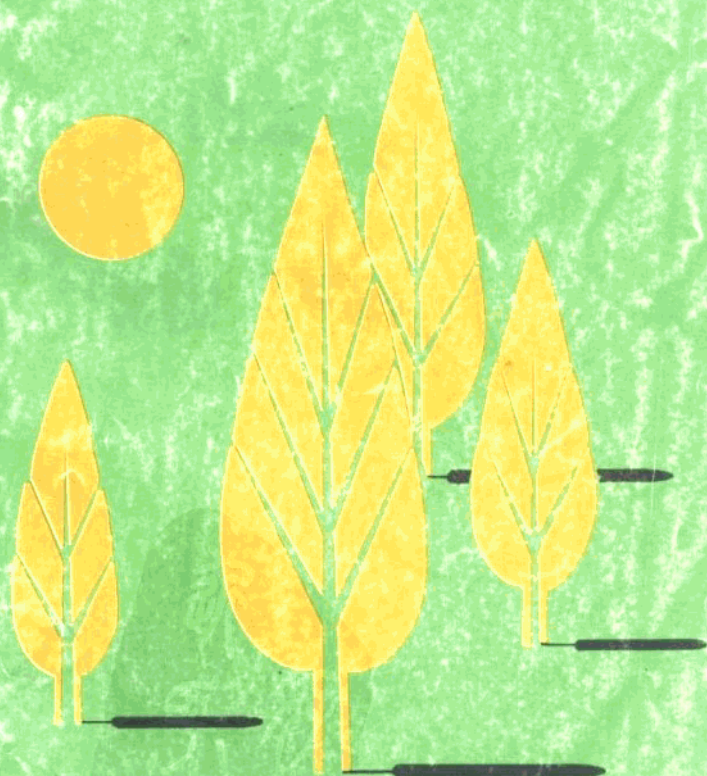


大地的儿女

献给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建校40周年



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

2541/27 13

顾问：艾荫谦 翁之馨 阮家德 蒋孝三

主编：徐晓村 王珠珠

编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卓 王之盈 卢兆彤 邢改兰

刘 莉 孙俊波 向朝阳 许朝辉

李永文 范力军 张代华 单宇红

赵建国 鲁军平

序

艾荫谦 翁之馨

认真读完《大地的儿女》全部书稿，心情非常激动，我们为培养这些在农业工程领域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中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学子们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欣慰。

我们是大地的女儿，生于斯，长于斯，又服务于斯。大地就是祖国，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子们驰骋的沃土。从这本集子中人们可以看到儿女的命运是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最早的毕业生是满怀着豪情奔向祖国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的。现在，学校已为国家培养了一万多名本、专科生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一万多名各类函授生、短训生、进修生。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性质各异，具体经历不同，但是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磨难之后，学子们在改革开放之中真正地迎来了施展才华、实现报国之志的春天。

书中，作者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向大家展示了40多名学子的风采。他们在整个书的编著过程中，尽管一直被人力、财力和时间等复杂因素所困扰，但是从书中我们还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子的理想、奋斗精神与崇高品格，感受到他们对母校的眷恋情怀。应该说，他们写的不只是这些学子，而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毕业的学子群。在这里你会找到自己，找到他或她，找到你们、我们和他们。

在校庆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的教育工作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未

来的工作将更加艰巨。一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上，而且更反映在毕业生的业绩上。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四十年来办学经验的总结，而且会激励在校师生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抓住时机，迎接挑战，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更多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作出贡献。我们建议把本书作为对在校学生进行校风教育的教材，希望更多的教职员和校友们认真地读读它，让我们相互勉励，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农业正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种划时代的变化，呼唤着农业工程科学与技术广阔的祖国大地上发挥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完全有信心也有理由相信，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校友们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因此，建议把这本书做为《大地的儿女》第一集，继续编辑下去。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

目 录

序	艾荫谦 翁之馨
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采	徐晓村 (1)
迷人的笑容	葛长银 王珠珠 (7)
春华秋实	王珠珠 (12)
大将风范	徐晓村 葛长银 范力军 (20)
从荒原出发	徐晓村 (28)
强者之路	金俊荣 (34)
播撒葱翠与丰饶	洪建武 王珠珠 (43)
超越痛苦就是辉煌	徐晓村 (48)
外面的世界很精采	徐晓村 (54)
祝你青春永驻	徐晓村 (60)
小地方的灵芝草	徐晓村 (68)
一份无愧于母亲的答卷	朱卫京 (74)
投入地爱一次	徐晓村 (81)
那一座工厂那一群人	徐晓村 (87)
将平凡的日子过出光彩	徐晓村 葛长银 范力军 (93)
在苦难中获得升华的灵魂	葛长银 (99)
将火把高高举起	王珠珠 (105)
田野作证	葛长银 王珠珠 (111)
永远在开始	金俊荣 (119)
梅花香自苦寒来	洪建武 王珠珠 (125)
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人	朱卫京 (132)
事业的光环	葛长银 (138)
金钥匙的制造者	葛长银 (143)

不懈的纤夫	徐晓村 (152)
文小姐与“武将军”	葛长银 王珠珠 (158)
挽狂澜于即倒	胡启毅 (164)
“兰菊”的园丁	范力军 (170)
汗珠子滚太阳	朱卫京 (178)
热爱机械的总经理	王之盈 王珠珠 洪建武 (184)
女性的风采	葛长银 (191)
压不弯的脊梁	朱卫京 (197)
科技树	葛长银 (204)
“韧”的奇迹	胡启毅 牟志宏 (214)
跃入激流	徐晓村 (219)
他从改革中走来	田京桥 (225)
开拓者的风采	金俊荣 (235)
路在脚下	王珠珠 (244)
飞扬的青春	胡启毅 (251)
明天他要远行	范力军 (256)
她，踏着这一方乡土	王晓芳 王珠珠 (261)
探索中的欢乐	王珠珠 (268)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张军 (274)
后记	

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采

徐 晓 村

余群，农业机械化系 55 届毕业生，现任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车辆研究所所长，教授。

1942 年 4 月 1 日，在越南工作的一个华裔铁路工人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堕地了。随着他格外宏亮的啼哭，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疲倦的微笑。她看着这个异常结实的孩子，心里默默地念叨：“老天爷保佑这个孩子，让他活下来，让我们晚年有个依靠吧。”

这个家先后生了十几个小孩子，都夭折了，这个新出生的婴儿是他们的希望。不知道是老天爷听了母亲真诚的祈祷还是命运再也不忍折磨这一对勤劳善良的夫妇，这个儿子长得活泼健壮，而且聪颖异常。孩子五岁那年，这一家人回到了中国，在昆明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住了下来，这里有一家铁路工厂。谁也没有想到，在越南的五年决定了这孩子一生的命运。

那时他的名字叫余继泉。

他七岁的时候，一位亲戚出钱把他送进了一所教会小学。僧侣般的管理并不能束缚他的顽劣，在学校里他依然肆无忌惮的调皮捣蛋。学校里教音乐的林老师是一位大家闺秀，人也长得非常漂亮。有一天，余继泉正领着一帮小家伙在街上疯玩，发现林老师和英国领事走在一起，他就率领那帮下属围住他们起哄。为此，他受了处分，留校查看。其实，这还是校长因为他学习成绩优异格外开恩，没把他赶出学校。不过这样的好校长并不总有，而且有时候还有比较长的青睐更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领

略了被开除的滋味。

上了中学，他先后被开除了几次，不过这时候已经不是因为调皮，而是因为政治活动。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利用打篮球的机会，他到监狱与被捕的同学取得联系。在他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事情暴露。在他乘车回家的路上，一个好心的铁路员工跳上火车告诉他，有人在车站等着抓他。当时火车已经快要进站，多亏他经常在铁路上玩，学会了跳火车。他从疾驶的火车上跳了下去，跑到亲戚家藏起来，躲过了搜捕。

大军南下，蒋家王朝土崩瓦解，余继泉结束了不断被开除、转学的动荡生活，考入了云南大学工学院航空系。作为这段生活的一个记录，他的名字变成了余群。那是他被开除之后起的一个化名，原来叫余益群，报名的时候漏了一个“益”字，他也没在意，反正也是假的，谁知道这个名字就这么一直用了下来。

云南大学航空系几经合并，1952年他来到了北京航空学院。他仍然是蓝球场上的高手，是当时北京高校联队的前锋。打球占去了他不少时间，但他的学习成绩仍很出色。苏联专家进校后，他和一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推迟毕业，留校继续学习。不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他被通知要转校，理由是海外关系，不适宜搞关系到国家机密的项目。他来到了我们学校。本来是搞飞机的，现在改成搞拖拉机，他从天空落到地上，开始了与泥土打交道的生活。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不被信任的经历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但余群想得开，“国家机密确实不适合我这种有海外关系的人搞。”一句话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总是不能被信任，而他仍能泰然处之。

大学毕业之后，他留校搞教学。或许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吧，他意识到过去打球占用的时间太多，便发奋起来。其时他担任苏联教师的助教，俄语却一窍不通。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就过了笔译这一关。那时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觉。深夜一两点才上床，

早晨六点就起床开始工作了。他的俄语水平至今仍然很高。前两年他还一边翻译一边给学生讲了一本俄文版的《土壤力学》。他颇有语言天份，会英、俄、德、法四门外语，除了英语都是自学的。他对自己的自学能力相当自信。大学毕业之后，他从没出去进修过。有进修的机会他也因工作需要放弃了。在他后来所从事的地面力学这个领域所需要的大部分知识都是自学来的。

地面力学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一九六二年才在都灵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它的兴起首先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各式各样的军用车辆必须解决在各种困难地面，例如冰雪、沼泽、沙漠、滩涂上行走的问题。恰恰在这个时候，余群也开始了地面力学的研究。推动他的是工作需要。万鹤群教授要去办农场，他的两名研究生交给当时只是讲师的余群负责，他们选择的研究方向正是地面力学问题。两名研究生毕业了，这个研究方向展示的广阔前景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遗憾的是十年动乱开始了，他和许多老师一起去了农村。

中国的知识分子真可爱。他在农村干活也像做学问一样认真，卖力。收割、运肥、挑担他很快学得熟练起来，成了一名“整劳力”。打篮球练出的好身体帮了他大忙。他能挑几百斤重的担子，以至于生产队长开玩笑地说不能把扁担借给他，怕他压断了。那时候他真诚地认为自己需要改造，并且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正是改造的最好途径。尽管他从未轻视、鄙薄体力劳动。

从农村去了四川，从四川到了河北，学校在这场大搬迁中的损失无法计算。最重要的损失是时间的损失，正如我们国家在这场民族性的灾难中失去了一次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一样，作为知识分子没法从事研究工作，余群也在各种各样的杂事中耗费了大量时间。这是他仍然见缝插针地自学了德语，并且广泛流览、翻阅当时能够看到的国外学术刊物，了解地面力学发展的趋势与进步。这是当时他仅能做的事情，却无疑使他在重操旧业时能胸有

成竹。

文革结束，学校终于搬回了北京。他抓的一件大事情就是建起了滑转率控制连续模拟轮胎试验土槽。这时他是课题负责人。这个土槽至今在国内仍然是先进的。很多单位是从他们那里学去的。整个设计安装都是教研室的人自己动手干的。他也和大家一样帮着把几吨重的钢梁抬起来固定在屋顶上。他始终保持了劳动者的本色。尽管早已是名教授，他仍参加每周一次的打扫卫生劳动。临出国了，理发还是让实验室的同志代劳。实验室的同志说，“咱们的理发技术达到了出国水平。”说真的，换上工作服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个教授。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自觉与体力劳动者认同的观念在他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只有他不断拿出的科研成果表明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土槽的建成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他和他的学生刘任先又发明了精确网格喷印法。说出来外行人都不信，在此之前，国内国外对土壤应变的观测都是用画粉线这种原始的办法。并且只能了解土壤表面的应变情形。这种新方法使观测土壤内部应变成为现实。当他在英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这种方法时，引起了同行们的极大关注。前不久，他在国外的学生还想把有关这种方法的论文译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上去，他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他带领他的学生又前进了一步，把观测的应变情况用照相或录像的方法拍摄下来，再输入计算机，从而使数学统计成为可能。这一成果使土壤中应力应变场的分析从定性阶段提高到定量阶段，它对于整个地面力学研究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他很有点“死心眼”。发表了那么多篇论文，却从来不署他爱人的名字。都在一个教研室，又是同行，署上个名谁也说不出什么。你知道人家参加没参加研究？评职称，长工资都有好处。可他不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绝不含糊。

他的课题不少，经费自然也不少，可学生想复印点资料必须经他批准，凡是与研究项目无关的东西，比如外语资料之类一律不行。有一个学生在图书馆拿了一本书，被发现了，请他说情。他非但不说情还把学生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他简直没法掩饰自己对各种丑恶行为的厌恶。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不合理的事情他都敢拍案而起，不顾忌这样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影响。

他的课题经费节余的钱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装入自己腰包的。有人这么干过，用这笔钱买电视机、录音机、计算机，搬到家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变成了私人财产。他却把课题经费的帐本放在教研室里。花多少，干什么花了都是公开的。节余的钱大多变成了实验室的设备。据实验室的同志说，用他的课题经费买的设备至少价值二十多万元。

学生们都有点怕他。搞研究打马虎眼是不行的。有个学生做实验的时候他正好外出开会去了，等他回来实验已经做完了，他一定要叫那个学生当着他的面重做一遍。就这样，学生们背后都说，余老师为人正直，对学生很好。博士生张招祥两年没回家过春节，他三番五次地请他到家里去吃年夜饭。后来见他实在不好意思去，他说，“干脆，我把菜做好，你端到宿舍吃吧。”

当他的研究生学习任务重，有不止一个学生半路想打退堂鼓，都让他给说服留下了。他对学生的爱护是具体而入微的，最主要的是要求他们严谨的学风。正是因为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教出了不少好学生。有一名学生在美国学习时成绩优异，受到导师的器重。国外的学生们常给他来信，谈思想、学术、生活。有一个学生在给他的信中说：“你是真正的人民代表。”这句话显然不是或不仅仅是指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这是对他整个人格的赞语。

他是两届北京市人大代表，还是国际地面力学学会理事，我国地面机器系统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还有一大堆其他头衔。他真是忙，但精力仍很充沛。听说他现在

已经不打篮球了，改打乒乓球，横握拍，纯粹的消极防御战术。这样跑动多，运动量大。不过这种战术在他的生活上不适用，在生活里他属于攻击型。尽管已经五十九岁了，他还是开始了车辆动力系统的研究。

在我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没说一句调子太高的话。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真有点困难。可是，正是这样，才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风采。

迷人的笑容

葛长银 王珠珠

华佑明，农业机械化系 56 届毕业生。

华佑明，这是我从江西校友们的嘴里听过不知多少遍的名字。每当谈起他，人们总充满了感叹和敬佩。

他是个乐天派，然而他的乐观却衍生出了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悲剧……。

那是 1956 年，刚刚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的华佑明满怀喜悦来到了江西南昌，这是一个小单位，他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单位领导自然要把他当成个“宝贝疙瘩”，技术由他负责，生活上领导安排得好好的，华佑明一身的劲全部使在了搞好工作上。

在苏联电影里他理解了：共产主义。“我从事的事业尽管平凡，但它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华佑明常常这样联想，常常为想起这些而由衷的愉悦、兴奋！人们看到这个小伙子整天乐呵呵的。乐呵呵地学习，乐呵呵地工作，乐呵呵地与人相处，仿佛世界对于他总是阳光明媚，生机盎然。

然而 1959 年的一天，华佑明被人家做为单位里的“白旗”拔掉了，因为他是这个单位的唯一一个最高技术职称——技术员的拥有者。眨眼之间，他从一个业务骨干变成了一个右倾分子，被分配到南昌市郊区的一个农场去了。

被剥夺的不只是业务工作的权力，还有政治生命、工资和正

常人的生活方式……。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将怎样承受这眼前的一切？

多少人倒下了，多少人自杀了，在那个年月里哪个人能为这些冤屈的人们公开鸣一鸣不平！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主人翁没有倒！他在南昌荒郊野外的那个农场里乐呵呵地拿着每月20块钱生活费，勤勤恳恳地接受“劳动教育”。

乐观，对一个正常人是一种希望与进取，而对一个处在沉重压力之下的人则是一种强烈的自信与力量，它可以使人的内心在阴霾的日子里充满阳光。

华佑明心中的阳光是党和人民给的，他相信党和人民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一个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抛弃他的。他想：“现在无非是让我换了个环境，管它干什么，只要能劳动就会有成绩，就对国家有用处。”多想想这些，他自然会笑，会笑出声来，还会自言自语地带出一句：“别的都是瞎扯淡！”于是他轻轻地摇摇头又干活去了。

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乐观，别人会赞美你，而一个人处在阶下囚的地位，你仍能超乎常人的乐观，则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文革之中，有人又一次揪住了华佑明。

“接受劳动教育，整天还在笑，你什么意思？”

“分明是没有接受改造，想变天，跟共产党反攻倒算！”

……

华佑明的目光循着这声嘶力竭的话扫了过去，那是一张张被激动涨红了的脸，也是一张张着被“愚昧”和“浅薄”注释着的脸。他可以回答他们的就是脸部肌肉的自然运动。

他仍然是笑，这时候的笑，在对方看来却是大逆不道的。他的笑声还没有落下，一阵拳、脚已经打得他前后踉跄起来……。

他进了“牛棚”，脸上仍然挂着那似乎永远也抹不掉的笑容。白天他依旧卖力气的劳动，晚上他依旧嗽空读书。只要哪里机械

需要维修，哪里有技术难题需要解决，他一准跑去给你乐呵呵地修好，又乐呵呵的离开。

华佑明的悲剧最终结束，已是八十年代初。用自己生命最辉煌的一段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他无怨无悔，在祖国这场巨大的悲剧之中，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

后来，他到了江西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全权负责农机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歧视，当他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把握这种权力的时候，兴奋的同时更使他感到千斤重担压在肩头。“出口商品质量代表了国家的声誉，进口商品质量直接带来的不是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损失。我绝对不能有一丝的疏漏”。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

劳动教育时就形成的一丝不苟的作风加上如此高度的责任感，华佑明在几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商检局进出口免检资格。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承认，这种承认是1956年毕业以后第一次象模象样的承认，虽然来的太迟太迟，却还是在华佑明的心中涌起了自豪与荣耀之感。他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可他却极难被别人承认，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免检资格中，找到了自我与社会评价的和谐！多难呀！20年。

由于业务工作，华佑明经常出国。开始总有人担心，华佑明还会回来吗？凭他的技术、他的外语，在国外找一个落脚之地是不会成问题的。何况他在国内受了半辈子的罪，现在还是一副“寒酸”相！每当领导听到这话，总会把眼睛一瞪，说：“他会跑哪儿去？跑！”

没有人回敬过领导，而领导也清楚，他的话压制不住那么多人心里的“小九九”。国门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赫然摆在世人面前，两种价值观的激烈冲击，使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在发生变化……。出国热、出国潮，出国成了不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

然而，华佑明从美国考察回来了，随身带下飞机的是一个齿轮变速箱！前往机场接他的人看着他满头大汗，累成这样，不免责怪他：“干嘛不托运呀！”他还是笑，嘿嘿地笑，一副可鞠的憨态：“挂行李要花钱，办手续也挺麻烦，不如扛回来，多省事。”他说得那么平静，那么痛快，象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似的。很多过去怀疑过老华的人，这回服了。他出国节约了外汇没有为自己置买洋家电，而买了一个工作上要用的变速箱。人们不得不感叹，华佑明真是和别人不一样！

90年代初，外贸企业在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迅速从国家计划指令下走向了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每一个外贸企业都必须进一步考虑企业的效益。江西机械进出口公司决定在广州与外商联合办一个公司。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华佑明去挑大梁。

组织上找华佑明谈话，一再申明这个企业的重要以及这个职位的责任重大，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好好干！”然而，这一次老华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了，他严肃地说：“我要提几个条件！”

领导显然为这位一向不提条件的人的反常感到惊讶，没等领导讲话，华佑明坚定地说了下去：“第一，给我提职称；第二，增加工资；第三，允许每周回来看老伴；第四，带儿子去。”

“可以！一言为定”。领导爽快地答应，反而使老华不好意思了，他的笑变得不自然，连忙解释说：“我去主管技术，没有高级职称，拿在南昌的一百多块钱，会让外资合伙人看不起，压不住阵，没法工作……”

领导理解老华，拍了拍他的肩膀，有内疚，有鼓励，更有感激，“老华这大半辈子真是不容易呀！”他想。

在华佑明悲剧式的生活中，却扮演了爱情的成功者。在别的人纷纷地与“出了问题”的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离异的时候，一位同样乐观和坚强的姑娘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南昌郊外的农场，与华佑明结婚，并留了下来，与丈夫一起勇敢

地迎接生活。

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有了儿子，有了给他们带来欢乐与温馨的小宝宝，也有了和他们一起受苦受难的小生命。

.....

华佑明调到机械进出口公司，领导上特地给他在市里分了三室两厅的房子，可是老伴住不惯，一到这儿来就生病，回到农场那个苦地方身体就没事了。看到在农场住得安安生生的老伴，华佑明心里好难过好难过。他知道妻子为他付出的不只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毕生的精力，毕生呀！他太忙，欠妻子的太多、太多，他应该无条件地给她一切，起码他可以继续让她在这世界上作一位精神上的富有者，与她相携，不论贫富，生生世世在一起。

他也愧对儿子。儿子已是公民，却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老子给了他苦难，却还没有给他本领。他要教他谋生，教他用自己的手为人类做出有益的事情。他多少次为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而苦恼，这一次他决心带他到商品经济中去学习游泳。

华佑明就要出发了，父子俩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人们告别，大家发现老华脸上依然挂着笑容。笑使这位快 60 岁的老人，看上去至少要年轻 10 岁。

生活对他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他自信自己借改革的徐徐东风，鼓起新的风帆，就一定会达到理想的彼岸。